

西部现代化进程中的 乡土文化传播研究

以通渭小曲为例

姜 鹏◎著

海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部现代化进程中的
乡土文化传播研究

以通渭小曲为例

姜 鹏◎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化传播研究：以通渭小曲为例 / 姜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 - 7 - 5161 - 9529 - 1

I. ①西… II. ①姜… III. ①乡村—地方文化—文化传播—研究—通渭县
IV. ①G127. 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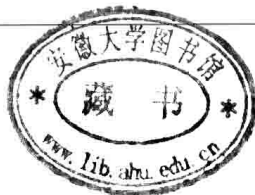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557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潜
责任校对 季 静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 75
插 页 2
字 数 252 千字
定 价 56.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姜鹏的这部专著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终于准备出版了，邀请导师作序。基于对他的为学为人的了解和博士论文开题及进展和修改过程中数易其稿的经历，我应允了。

姜鹏来自陇中地区，2010年考进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攻读“传播与社会发展”方向的博士学位。由于他的生活、学习、文化、工作背景，他对西北现代化进程中乡土艺术的发展和保护具有一贯的关心和兴趣，读博的学习方向因此令其如鱼得水。他曾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东南隅，西北角，大地上没有我的足迹，但我已走过。”毕业之时，面对着求职中的多种机会，他选择了回到西北，任教于西北大学。

记得考博面试时，姜鹏用英文表示自己读博的目的之一是拓展知识面。入学以后，他在导师的严格指导下始终践行自己的诺言。他的特长之一是有较强的理论思维，喜欢哲学，善于把握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在宏观上把握问题。但与此同时，他对于实证研究的细节要求，小至一个标点符号，一个着重号，都十分用心，做读书报告时几乎从不出错，不论是大的误差还是技术性差错。偶有一两处，经导师指出，绝不二过。兼备上述两种特质的博士生，其实不多见。同时，平和的性情使其能够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各种不同的传播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区别，从中梳理出适合自己的思想进路和理论途径。

由于出身书画之乡，或许是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姜鹏最终将博士论文选题锁定在西北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化传播。经过与导师反复磋商探讨和开题答辩，他回到故乡，一竿子插到底，在最基层展开田野调查，做系统、详细的观察和访谈，思辨与实证结合，宏观与微观兼顾，拍摄现场照片，一切亲力亲为，取得了许多宝贵的、富有质感的第一手资料。结论

和对策性建议均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他耐心地听取导师的所有修改意见，连引注的细节也不放过，最终作品十分规范、严谨，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论文的进展过程体现了他一贯的特色：愿意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甚至是超过老师们所要求的高标准，willing to perform above and beyond duty。

细究起来，凡是受过经院式传播学理论与研究训练的人才，一般在学术上都大同小异，恰似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那么，还有什么因素能将博士与硕士区分开来呢？我想，其中的因素之一就是他们对待“人”的态度。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们的一切努力应该是为了令人生更加充实美好，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家园。姜鹏的博士论文从选题动因到调查成果及成稿努力，都体现了这种终极关怀。其行文笔调也佐证了这一点。

于是，出于对弟子的持续努力的肯定，遂作此序。相信他会再接再厉，在学术上继续进步。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熾如

2016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1)
二 概念、理论与文献回顾	(7)
(一) 现代化·现代性·发展	(7)
(二) 社会发展中的传播及其角色	(9)
(三) 传播与乡村社会发展研究综述	(22)
(四) 文献点评与问题的提出	(34)
三 研究方法与概念界定	(35)
(一) 田野调查地点的确定	(35)
(二) 研究方法	(36)
(三) 概念说明: 乡土文化	(40)
第二章 发展传播学视阈中的乡土文化社会功能分析	(42)
一 区域及文化特征	(43)
(一) 通渭人文	(43)
(二) “通渭现象”	(45)
(三) 通渭小曲	(46)
二 乡土文化社会功能分析	(49)
(一) 仪式主导下的“狂欢”和“凝聚”	(49)
(二) 无声的教化	(55)
(三) 对抗“工具理性”的理性工具	(57)
(四) “小传统”的现代功能	(61)
三 社会与人的现代化	(63)

第三章 西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化传播流变	(65)
一 西部现代化对乡土文化的影响	(65)
二 西部乡土文化的传播流变	(67)
(一)传播与传承模式的流变	(67)
(二)旧瓶装新酒	(80)
(三)文化生态环境的流变	(84)
三 乡土文化流变的影响源	(89)
(一)市场经济与乡土文化变迁	(89)
(二)大众传媒与移植文化	(92)
(三)政治的介入	(96)
四 乡土文化困境的生态学分析	(101)
五 魏家庙庙会	(105)
第四章 新农村建设语境下的西部乡土文化及其传播创新	(111)
一 文化滞后与乡土社会文化失调	(112)
二 二元文化的结构性矛盾	(116)
三 离土农民的文化尴尬	(121)
四 乡土文化传播创新	(123)
(一)传播主体建设	(124)
(二)媒介创新	(127)
(三)内容为王	(130)
(四)传播体系与制度创新	(133)
(五)传播生态: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135)
(六)翰墨通渭:一个成功的个案	(137)
五 不能缺席的教育传播	(141)
第五章 全媒体时代的西部乡土文化传播	(146)
一 全媒体时代的乡土文化转型及变迁	(148)
(一)当乡土文化遭遇全媒体	(148)
(二)乡土文化变迁与“媒介景观”	(151)

(三) 乡土审美的断裂与现代张力	(157)
(四) 公共空间的私人化	(164)
二 传统与现代:传播模式的比较	(168)
三 传播模式的“文化后果”	(173)
(一) 共同意义空间:减小还是扩大?	(175)
(二) 情感定势与文化模式	(177)
(三) 传播“后果”与文化品格	(179)
四 与现代媒介相融共生	(181)
五 媒介文化——新乡村的建设者	(188)
第六章 结论	(197)
一 人即是传播,传播即是重建	(197)
二 与时俱化,传播创新——生存发展之根本	(199)
三 文化生态建设——化解危机之关键	(202)
四 “调和”与“共生”——媒介化生存的最优化策略	(203)
五 形散而神不散——乡土文化的表象与未来	(205)
附录	(208)
参考文献	(213)
后记	(226)

第一章

绪 论

“一个民族不应该只有 GDP，还应该 DNA。”^①

——冯骥才

一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中国描述为“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他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无疑的是‘土地’”^②。费先生描绘的是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那时的中国是一个超级农业大国，农民占整体人口结构的比例最高，农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国民经济的支柱。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特殊的国内与国际环境，当时的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整个中国的乡土气息相当浓厚。历经六十多年的风雨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等诸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发展速度日新月异，创造了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神话”。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2012 年版），

① 职茵：《“大唐西市论坛”开讲：冯骥才谈及“非遗”保护——不能只有 GDP，还应该 DNA》，《西安晚报》2008 年 10 月 30 日，第 4 版。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 页。

截至 2011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 50% 的临界点，达到 51.27%，城镇人口也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 6.9 亿人，城市创造的国民产出达到了 90% 左右。^① 这样看来，现在的中国似乎已经不再是费先生笔下的“捆绑在土地上的中国”了，农业人口比例在减少，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根基严重动摇。农业生产环节中所必需的种子、肥料、农药、机械等都需要在城市或城镇的工厂中生产，农业产品的运输与销售更离不开现代交通物流和城市市场。与此同时，城市的工业产品也像洪水般涌入农村的千家万户，电视、电脑和各种电器深深影响和改变着农村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观念。城市和农村，就如一对孪生姐妹，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全国仍然有大约 300 万个村社，它们依旧是我国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伴随着城镇化的深入，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城市的缔造者。除了一小部分进城务工人员转变为城市人外，更多的人则过上了城乡“两栖”生活。从这个状况来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打上了乡土的烙印，乡土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中国城市或城镇的底色。因此，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需要从乡土社会中探究根源和寻找答案，而其中的乡土文化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巨大助推剂，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思想导引和智力支持。钱穆先生从源头上将文化分为三类：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显然，中国文化是非常典型的农耕文化，其主流价值观涉及天命观念、家族本位、礼俗伦理、中庸之道等，这跟西方以商业为显著特征的文化截然不同。文化产生的根源和成长土壤的不同决定了不同文化不能按照统一的模式发展。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只有适应国情的文化模式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而乡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模式的显著代表，其重要意义不言自明。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迈进。在社会大变迁的过程中，城市化或城镇化进程

^① 潘家华、魏后凯：《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5——迈向城市时代的绿色繁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

加快，西方文化与城市文化不断地挤压、侵蚀着乡土文化的生存空间。在现代化洪流的裹挟下，中国乡村也逐渐具有了诸如个人主义、理性化、非感情化等西方发达社会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征，人们的精神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同于城市，乡土文化有一种被边缘化的趋势。我们暂且不对这种变化作任何价值判断，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乡土”的变迁，已经影响到了中国文化之“本”的生存。这对于中华民族树立共同文化意识，形成对国家、对民族文化，乃至自我认同都不是好消息。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梁漱溟先生毕其一生都在思考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他最终选择了改造与建设一个“新乡村”来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今后除非中国民族更无前途，即也没什么自救运动再发动起来；如其有之，新运动之趋向，将不能不从‘民族自觉’出发。”“民族自觉的头一步，便是觉悟到乡村，从这一步，就可以觉悟到一切，觉悟到我们原来的社会构造的特殊，觉悟到我们不能不自有我们的前途。”^① 乡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任何民族的基本文化标志。因此，研究乡土文化对保持民族及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具有决定意义，这就是论文选题的第一大缘由。

伴随着现代化的脚步，城市文化逐渐渗透到乡村的角角落落，乡村文化生活逐渐“类城市化”。我们可能想当然地以为乡村文化生活将更加丰富，更加多彩，然而，现实的情况将我们的美好想象击得粉碎。在现在的乡村，不仅我们童年记忆里的一些乡土文化生活，比如庙会、皮影戏、社火表演、踩高跷、地方戏曲等鲜有踪影，而且更为糟糕的是，由于青少年对民族文化没有深切的参与和体会，所以对民族历史、民族文化认知肤浅，并且深受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安全”受到威胁与挑战。同时，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在闲暇时间选择了聚众赌博、群体喝酒、闲聊闲逛等不健康的方式打发时间，乡村文化生活已经变得极为单调、枯燥和乏味，乡土文化前景着实堪忧。

乡村“类城市化”的发展，不仅使得乡土文化的根基受到极大的破坏和影响，而且让人们的生活具有了一定的“工具理性”色彩。“工具理

^①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页。

性”是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最直接、最重要的思想渊源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提出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是由理性主义主导的，在这个社会里，“人们被赚钱、赢利所支配，将其视为人生的最终目的，经济赢利不再属于人类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①。这种生活状态完全超越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想象，“每个人都将聚敛财富当做生活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背着钱财和物质负累潜入坟墓，这只能理解为某种反常本能——拜金欲——的产物”。^②在韦伯看来，现代性就是一朵带刺的玫瑰，现代社会就是工具理性不断扩张与宗教脱魅的过程。现代社会的人拥有理性，却没有了价值追求，只懂享受，漠视情感，彻底沦落为生活的奴隶，是“无灵魂的专家”和“无心的享乐人”。于是乎，手段成为目的，成为套在人们身上的桎梏和枷锁。这就是现代社会所具有的“工具理性”色彩。继马克斯·韦伯之后，卢卡契、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都对工具理性有过论述，批判其导致的人的“异化”和“物化”现象。工具理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视野中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痼疾，是“科学”与“理性”主导的现代社会的“阿喀琉斯之踵”。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秉持人文精神，强调“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这完全不同于西方具有强烈工具理性色彩的现代文化，是一种以家庭伦理、礼俗礼制为本位的文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初步建立，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唯利是图的商品拜物教思想是否也毒害和侵蚀着中国人的思想与生活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把乡土文化作为研究对象，提升保护意识，对抗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营造共同的精神家园就有着巨大的文化意义，这是论文选题的第二大缘由。况且，文化现代化是社会整体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现代化背景下的乡土文化，促进乡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也是实现新农村建设与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环节。

①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众所周知，传统乡土文化主要倚重“代际传播”方式进行流传与保存，其叙事方式偏重于音义结合的口语媒介，具有显著的地方性、民间性和草根性特征。随着乡村“类都市化”的发展和以城市取向为核心的外来文化的传播与冲击，乡土文化的处境尴尬，危机四伏。危机首先表现在乡土文化的传播与流传方式发生了变化，其生态环境与传播秩序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以金钱和利益为核心的拜物教文化有替代“代际传播”的乡土文化的趋向。因此，无论是探究现代化背景下乡土文化的变迁，还是要有效地保护乡土文化，传播这一维度至关重要，这是我选择传播作为研究关键词的一个重要缘由。

另外，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让人类进入了全媒体时代，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使得媒介话语权多元化。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体具有强大的“定义现实世界”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隐蔽性。他认为媒体本身的形式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不同的媒体对于内容的偏好有所不同，比如报纸偏好文字，而电视更偏好图像，不同的媒介偏好就会影响和塑造出不同的文化。这就是尼尔·波兹曼“媒介即隐喻”论点的主要内涵。^①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交流方式，使得人类社会实现了从印刷时代向全媒体时代的转变。大众媒介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接收方式和生活方式，延伸了人的官能，也笼罩并影响着乡土文化的审美空间与想象。乡土原生态文化中“人界—物界—神界”的对话交流方式及其根基开始松动瓦解。在审美空间的断层上，大众传媒强有力地介入，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审美空间，营造出现代化背景下的乡土文化“媒介景观”。伴随这一过程，原汁原味的乡土文化被以各种方式解构、建构和延伸，其生存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多种变化，这一现象也值得我们仔细钻研探究。所以，现代媒介环境下如何更好地保护、传播与传承乡土文化，是中国传播学界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具有较大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的问题，这是论文选题的第三大缘由。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土地面积约为 685 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土

① [美]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地总面积的71%，而西部人口也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27.04%，^①可以说，如果没有西部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没有西部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没有整个中国的精神文明。

因为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西部地区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较东部要小，乡村生活的气息浓郁，乡土文化留存的土壤也更为肥沃一些。费孝通先生非常关注西部乡土文化的发展问题，曾先后九次到甘肃兰州进行考察，当谈及乡土文化的重要性时他说：“经济的发展只能解决我们生存的基本问题，但如何才能生存得更好，更有价值，使自我价值的发挥得到更宽阔的拓展，并从中发展出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需要原有的在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用文化和艺术的再发展来解决的。”^②文化对人具有熏陶、陶冶与教育的功能。乡土文化作为乡土社会的人存在的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巨大。英克尔斯认为，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表现在人的思想、心理、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③因此，加强西部乡土文化及其教育功能的研究，对于促进西部人的现代化，加快西部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最近几年，国家将文化放到了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强调要提升国家“软实力”，捍卫“文化安全”，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与复兴。从2010年到2012年，国家陆续出台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这些文件首次以罕见篇幅着力论述了文化产业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问题，提出要构建现代文化产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文化产业获得跨越式发展，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从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国家把文化提升到战略高度来重点规划，是文化发展理

① 数据来源于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新办2011年4月28日新闻发布会上所发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

② 费孝通、方李莉：《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民族艺术》2001年第1期。

③ [美]阿历克斯·英克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念的一种新突破，这对于西部以及西部文化的发展而言都是好消息。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研究现代化与全媒体背景下的乡土文化及其传播，发掘利用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对于推进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传播西部文化，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树立良好的西部区域形象，提升区域软实力，具有较大的发展意义，这也是本选题的第四大缘由。

二 概念、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现代化·现代性·发展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现代化”的概念看法不一，所以也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的概念，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社会发展领域里带有整体性变迁的一种现象、一种形式。C. E. 布莱克认为，它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①。北京大学著名现代化研究专家罗荣渠先生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化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提出了自己关于现代化理论的广义和狭义概念：“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改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② 具体来说，社会现代化作为一个大系统，是由“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城市化、科学技术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组织管理现代化

① [美] C. E.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页。

和人的现代化组成”^①。现代化既可以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可以指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过程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目标意味着人类社会对“现代性”的追寻和趋向。所谓现代化理论，也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有关现代化问题的各种不同学派的理论的统称。何传启将世界现代化的历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以工业经济为特征，是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第二次现代化以知识经济为特征，是指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他认为，第二次现代化不是现代化的终结，未来还会有新形式的现代化。当前，发展中国家正在主要完成第一次现代化，而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第二次现代化。他提出，有些国家，比如中国，正在同时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化，是一种“综合现代化”模式。^②

“现代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的时代性质或属性，可以称之为现代性(modernity)。”^③它是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各种属性之和，是相对于“传统性”而提出来的。因为它是对特征属性的描述，所以具有静态性的特点，而现代化一词侧重对发展过程的描述，因而更具有动态性特征。学者们对“现代化”的概念众说纷纭，也就导致了“现代性”定义的莫衷一是。关于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已有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孔德、斯宾塞、滕尼斯、迪尔凯姆、齐美尔、帕森斯、列维、勒纳、丹尼尔·贝尔、英克尔斯、麦克勒兰德、布莱克、艾森斯塔特、马克斯·韦伯、吉登斯、哈贝马斯、马尔库塞、福柯、塞缪尔·亨廷顿、阿普特、贝克、胡伯、弗兰克、沃勒斯坦等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见解，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展开综述。

发展与现代化的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概念的内涵来讲，发展要大于现代化。现代化具有阶段性，有起点，也有终点。发展则是绝对的、线性的，是一种由欠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持续不断趋近的过程，是一

^① 段若鹏、钟声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阶层结构变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② 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路日亮：《现代化理论与中国现代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种状态描述，没有起点与终点。发展概念的这种特点造就了一种发达与不发达、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的等级关系，成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变迁态势。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实就是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发达国家也有发展问题，何传启教授称为“第二次现代化”。

“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涉及新闻学、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属于边缘交叉学科范畴，其议题围绕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展开，主要目的是探索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的成长和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信息传播领域是发展研究的“富矿”，它为社会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目前，信息传播领域有关发展、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下面就做一简要回顾。

（二）社会发展中的传播及其角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分崩离析，大量的新兴民族国家在非洲、亚洲、中东和加勒比海地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但这些新兴国家无论在政治治理，还是经济发展方面毫无经验可谈，它们甚至没有基本的医疗卫生设施，国民教育一片空白，衣食温饱都是大问题。与此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急于开拓海外商品倾销市场，他们把目光自然而然地投向了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但让西方资本家失望的是，极度落后的状态使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无力消费他们的商品，他们的美梦化为泡影也就成了必然。此外，战后美苏争霸，冷战格局形成，美苏双方都想极力扩大自身影响力，拓展自己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一系列的发展援助计划也就应运而生，而西方学者也开始把“发展”作为关键词，研究“不发达”问题，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破土而出。

人类对于发展概念的认识经历了很多阶段，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从最早的“发展 = 经济增长”，到“增长与公平发展观”，再到“人本全面发展观”，最后到“可持续发展观”，简约地勾勒出人类对社会文明发展认识的渐进轨迹与图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单一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会导致发展的不平衡与畸形，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于是，人们开始重新定义发展与现代化，逐渐认识到文化现代